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梁 颖 何龙群 容本镇 玉时阶

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 与文化变迁

秦红增 韦茂繁 等 著 YAOZUCUNZHAIDESHENGJIZHUANXING

民族出版社

YUWENHUABIANQIAN



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 与文化变迁

秦红增 韦茂繁 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秦红增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

(瑶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913 - 9

I. 瑶… II. 秦… III. 瑶族—社会调查—中国
IV. D63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30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69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913 - 9/D · 1521 (汉 242)

编辑室电话: 010 - 58130636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瑶学丛书”总序

在《瑶族通史》出版的同时，由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编写的“瑶族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海内外瑶族同胞的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1998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本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出版，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已经出版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族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编写“瑶学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

专家、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瑶族的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我们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有待培养后继人才。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我们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歧视，因而被迫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使一部分瑶人吃尽一山又过一山，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但瑶族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外国的瑶族有 60 多万人，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 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美国和泰国等地的人口较多。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这些瑶族都是明、清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在血缘、文化和思想感情上与国内各支系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居住在外国的瑶胞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常回国寻根问祖，旅游参观，频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互访活动。因此，在编写好《瑶族通史》的同时，编好丛书，让海外瑶胞了解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对促进国内外瑶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文革”期间工作上的失误，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代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现在党中央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瑶族地区是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研究成果纳入“瑶学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对指导瑶族地区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瑶族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有组织、有领导地编写“瑶学丛书”，抢救瑶族文化遗产，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举措。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这是为瑶族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本丛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安排的课题，得到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瑶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瑶族，还有汉族和壮族等其他民族，大家都踊跃撰稿，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民族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秦恒高

2005年12月19日于南宁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的缘起与方法	(1)
二、研究线索	(3)
三、研究各部分概述	(5)
第二章 作物、生计与文化:以布努瑶为例.....	(9)
一、调查地概况	(9)
二、玉米与布努瑶定居.....	(17)
三、经济作物与布努瑶的流动.....	(22)
四、结论与建议.....	(45)
第三章 技术、生计与文化:以过山瑶为例	(51)
一、调查地概况.....	(51)
二、乡村技术教育.....	(53)
三、生计转型.....	(58)
四、技术变迁.....	(68)
五、社区变化.....	(70)
六、结论.....	(75)
第四章 旅游、生计与文化的再建构:以红瑶为例	(77)
一、大寨概况.....	(78)
二、民俗旅游:传统文化再建构的动力	(79)
三、木质民居:传统民俗的空间建构	(84)

四、服饰文化:民俗旅游中的传统回归	(87)
五、手工艺品:民俗文化的商品化建构	(97)
六、晒衣节:民俗文化的集中建构	(104)
第五章 生计与环境卫生:布努瑶与红瑶的比较	(122)
一、民族村寨环境卫生现状	(123)
二、影响民族村寨环境卫生的因素	(135)
三、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卫生建设的未来走向	(146)
第六章 民族旅游与社区教育:以大寨红瑶为例	(150)
一、大寨红瑶旅游开发现状	(150)
二、旅游开发与大寨社区教育的变迁	(157)
三、民族地区旅游对社区教育的影响	(179)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与方法

提及瑶族，人们总会有一些定势的认识或标签。如：是个以山为伴的山地民族，所谓“山谷弥远，瑶人弥多”，“号曰山民”；支系众多，称谓繁杂，仅自称就有“勉”、“伏勉”、“门”、“布努”等60多种，他称更多达390多种；频繁迁徙，是世界性的跨境民族。至于在生计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如山地经济，以玉米为主食，刀耕火种式的游耕，烧柴火，打油茶等。其他还有石碑制、村老制、打同年或老庚的习俗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这些对瑶民的基本认知无疑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思维中，以致时常忽略了其身上所应有的现代性。或许是出于对文化消失的恐惧及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叙说某一民族的历史甚于其当下已是相关少数民族研究的通病。虽然不少学者从“变迁”角度做了不少论说，如文化变迁、社会变迁、习俗变迁，等等，但在给人以宏观概述之余，难免有精细不足之憾。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新”字着手，立足于瑶族农民生计方式的转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一个个典型的社区来反映瑶族现代的发展风貌。之所以要从生计方式的转型视角来剖析瑶族文化的变迁，是因为每个民族在其生存的过程中都有一种主要的用以维持其生活的方式，以实现其最基本的生存以及更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某个民族生计模式的变化是导致该民族文化变迁的基本因素。

人类学家孔恩用“适应策略”一词来描述一个群体的经济生产体系。他将社会类型划分为五种适应策略：搜食、粗耕、农耕、畜牧、工业化。^① 由于经济生产体系的不同，每个群体在其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如畜牧民族以畜牧养殖为生计模式，他们在水源和草资源丰富的地区放牧，居住的地点和房屋随时搬迁，有自己的一套畜牧技术和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耕作民族以经济作物种植为生计模式，因为有固定的土地用于耕作，所以有固定的村落、家等，也有自己的一套耕种技术和生活方式，相对稳定。即使是同一种适应策略，但由于地理环境、知识技术、种植或饲养的品种有所差别，每个地区、每个民族也会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一旦这个群体原有的经济生产体系、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必将导致其相应的新的文化的形成。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侧重探讨了某一民族的“生计模式”及其与文化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如罗素玫的《性别区辨、阶序与社会：都兰阿美族的小米周期仪式》，研究了台湾台东县阿美族1920—1930年还存在的小米种植形成以小米周期仪式为核心的阿美族的年度周期仪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特殊的男女性别区辨和阶序制度对社会的构建。^② 又如黄应贵《作物、经济与社会：东埔社布农人的例子》，论述了台湾东埔社布农人的主要作物在1920—1990年期间从小米到水稻到西红柿再到茶的转变过程中，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并且经由原有的hanido信仰与人生观来理解、转

① [美国] 科塔克 (Conrad Phillip Kottak) 著，(台湾) 徐雨村译：《文化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探索》，171页，台北市，麦格罗希尔出版，2005。

② 罗素玫：《性别区辨、阶序与社会：都兰阿美族的小米周期仪式》，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人类学刊》，143页，2005年第3卷第1期。

变，乃至创造有关新作物的活动及其文化意义等。^①

除了学理上的因素外，从生计模式角度来探讨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也符合中国的实情。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各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如科技下乡、参与式发展等扶贫或发展项目。一些新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农作物和家畜便随之进入这些地方且业已普遍化。当地农民与外界、与现代科技知识的接触和交流越来越频繁，生存思路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生计模式也逐步由传统转向现代。所有这一切都给当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交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等，莫不如此。在巨变的时代潮流面前，学者们力所能及的研究只能说是沧海之一粟。

二、研究线索

因为现代性、生计模式范围都较宽泛，面面俱到的描述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损于研究的深度。故本研究中，我们同样首先抓住科技下乡这一线索，将科技下乡与瑶族农民的生计方式联系起来，在描述当地人面对现代性的态度与选择的基础上，探究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当然是最主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人。说到这一点似乎有悖于文化相对论，但我们也不能将其庸俗化，或拿其作为拒绝变革、排斥先进的工具。事实上，革新开放正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所在，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之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如同千万个变化着的村庄一样，每一个瑶族村寨也都经历着革新开放的过程。如包产到户，村民自治，

^① 黄应贵：《作物、经济与社会：东埔社布农人的例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6）。

进城务工等，在一系列革新开放措施中最主要的是科技下乡。从表面上看，乡村表现出外源式发展性质，但从实质上来讲，正是由于其在培养、塑造新型农民即“文化农民”方面的巨大功劳，才使得乡村的内源式发展能力有了质的飞跃。^① 这一点中国与孟加拉等国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的着眼点在于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或者步入乡村都市化行列，单纯的包产到户或小额信贷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其需要的是农民全方位的或脱胎换骨式的跃迁；而后者的目标在于解决乡村的温饱，立足并通过小额贷款等方式激活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

为此，本节特选取了两个典型社区，分别以经济作物种植和现代技术传播为切入点来剖析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应用过程中瑶族农民表现出的生存意识与发展策略。前者以广西大化县布努瑶为田野调查点，目的在于观察新的经济作物被引入后，布努瑶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后者以广西恭城过山瑶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对当地农民接受乡村技术教育过程的分析，探讨瑶族技术、生计与文化的共变规则。

如果说科技下乡是“外源而内发”的话，那么，目前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或民族旅游可看做是“内源而外发”。内源指的是乡村旅游必须立足于当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这是乡村旅游的基本点。不过，纯粹的或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譬如节日民俗，一年就那么几天过节，如果平时不“复制”或“展演”出来，就吸引不了游客的眼球；再如人们总是有着固定的生活习惯，即便游客都有着较强的体验“异文化”的心理准备，但事实上过分“地方化”的居住和饮食，仍然会让许多游客望而却步，这就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造”，以使其变得“标准化”或具有普同性，从而能够适应更多人的胃口。

^① 秦红增：《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所有这些“复制”、“展演”或“改造”、“标准化”都可看作是具有“去地方化”性质的文化趋同过程，这便赋予了乡村旅游浓厚的外发特质：由于当地人在资金、经营观念和市场信息分享等方面的劣势，导致外来的个人或组织进入社区进行旅游开发，并成功地取代了当地人而成为乡村旅游的主导者，如占据了景区内较好的地理位置，标准化的旅馆抢夺了较多的客源，以演出形式出现的对民族风情展演的垄断，成为景区管理规则的制定者，等等。与此相对立的是当地人的尴尬角色：出卖体力（抬轿、扛东西等）、打下工（旅馆服务员、景区导游等）或风情表演的演员等。乡村旅游的这种内源外发特质虽然充分地激活了市场，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景区服务千篇一律，缺少地方性和民族性，当地人因资源的缺失而成为旅游收益的最少受惠者，还有被批驳的因“文化展演”而造成的“文化损伤”等。故本书特选取广西龙胜县金坑大寨作为田野调查点，以反思乡村旅游给瑶族村寨所带来的影响。

科技下乡、乡村旅游、外出务工、市场流通等使相对传统、封闭的村落逐步走向开放，而开放不只是乡村人、物的流出，而且还意味着外面人、物的流入。如此一来，乡村循环的链条上便增多了许多元素。这也就有可能破坏乡村原有的自我恢复机制，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乡村公共卫生方面：如化肥、农药、洗发精、化妆品的过多使用会直接威胁到农村人的饮水安全；由于煤气、电能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农村垃圾的焚烧量，从而导致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包装盒随处可见，严重地污染了乡村的居住环境。凡此等等，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乡村山清水秀田园风光将会一去不复返。鉴于此，本书以广西都安县加文村和龙胜县金坑大寨为例，对瑶族村寨的公共卫生作出比较研究。

三、研究各部分概述

农作物的种植与乡村的生计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通常情况下，作物种植的变化决定了生计方式，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体系的

变迁。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农作物为农耕民族提供了最基本、最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某种或几种农作物的种植也就成为农耕民族生计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农作物种植的减少或增多，势必引起生计与文化的变迁，本书第二章“作物、生计与文化：从布努瑶为例”便分析了其中的道理及变迁的细节。

该章通过广西大化县七百弄乡布努瑶农民从单一的玉米种植扩展到种植金银花、养殖猪和羊等的种养案例，反映了布努瑶的耕作文化从定居走向流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并由此提出了作物的引进生产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技术变迁和生计转型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经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等讨论，并指出作物、技术与文化的共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共变的程度与速度和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当地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等多方面因素都有关系。掌握了作物、技术与文化共变的规律，对于如何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推动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从第二章（作者：广西区博物馆唐剑玲、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的研究也可看出，在当下少数民族乡村变迁中，技术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新的技术是如何渗透到乡村中去呢？本书第三章（作者：广西民族大学郑桂莲、广西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韦茂繁）以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为线索，通过对广西恭城县东面村过山瑶农民掌握抛秧技术、香菇种植技术及罗汉果种植技术等例子，揭示了技术变迁的一些特性，即从原生型到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原生型技术表现出它的自然性和经验性，而现代化技术则表现出它的科学性和知识性，并认为技术变迁并非是个处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外的单一封闭过程，而是环绕在多种文化因素中并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现象。它要求在满足社会群体的多重需求的同时必须兼顾其效益。由此得出，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将技术变迁与市场组织机制、社会组成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和把握技术发展的

本质和规律,从而促进民族地区或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以及文化的发展。

本书第四章(作者:广西民族大学胡宝华、广西民族博物馆徐昕)探讨的是旅游与瑶族社区变迁的关联性。近些年来,民族旅游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文化风情的和谐而受到更多旅游爱好者的青睐。同时,在旅游兴盛的背后,如何看待其给当地社区及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诸如当地居民的受益问题,因民族风情展演而带来的“文化真实性”问题,游客、旅游公司、当地人的关系协调问题,等等。本研究通过龙胜金坑大寨红瑶社区,从旅游开发、旅游纪念品开发、社区管理与教育等方面,探讨了旅游、生计与文化的关联性。认为随着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红瑶传统的生计方式、传统习俗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旅游开发的需求,一些本已消失的民族习俗却在新的情境下得以重新构建。比如当地“晒衣节”中,有一个“泥巴打仗赛”,已经消失了近百年,而现在当地人又复兴了这一传统的娱乐活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民族旅游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变迁问题,在以前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于2007年8月初又重返金坑大寨,有针对性地通过对当地“晒衣节”的复兴来考察民族文化的再建构问题。调查显示,当地人已经能够抓住“晒衣节”这一本土文化特质在现代民族旅游中所蕴涵的巨大价值。他们积极组织 and 筹办“晒衣节”节庆活动,开展各种红瑶传统文化、体育活动,目的明确,即要向国内外展示红瑶古老丰富的传统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并通过弘扬红瑶的传统文化,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已经认识到,除了梯田景观,还有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旅游的一个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应更乐观地看待类似大寨红瑶这类民俗文化再建构,认为其对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是非破坏性的,反而能够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近年来,类似于SARS等突发性的流行疾病,迫使人们日益

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农村公共卫生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之也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如有的分析了影响农村环境的四大因素^①一些学者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如建立和完善乡村医疗体系，进行人员培训，增加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和投资等。^② 本书第五章（作者：百色学院黄丽萍）也对此做了探讨，认为这些分析和对策相对于那些生存条件较好的乡村是适用的，而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的村庄因有其各自的特点需区别对待。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个案式的深入剖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做到标本兼治。为此，本研究分别选取地处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的两个瑶族村寨，即地处西南石漠化地区的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加文村布努瑶社区和地处桂北山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红瑶社区，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制度、文化及外来因素等方面，探讨了瑶族村寨的公共卫生问题，并提出了如因地制宜、提高当地群众的卫生意识、尊重地方性知识等相关建议。另外，本书也对当地的旅游与社区教育进行了分析，书成第六章（作者：广西民族大学梁圆圆、徐文华）。

当然，本书的几个专题反映的还只是瑶族现代变迁中的一个侧面，但也足以表明瑶族农民的现代风貌：开放，能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讲求科学，乐于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技能；注重民族传统，很好地保留了一些民族节日及民俗活动，等等。我们也坚信，瑶族村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动人。

① 朱益玲：《四大污染源威胁中国农村公共卫生安全》，光明日报，2003年10月4日。

② 朱玲：《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个误区——西部大开发与农村公共卫生投资》，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3）；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报告》，载《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1（8）。